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411

“一帶一路”倡議下澳門加快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研究

殷知行¹，許沈佳藝²

(¹澳門城市大學 澳門 999078 ²中共長興縣委黨校 浙江湖州 313100)

摘要：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澳門特區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頂層設計思路，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總體目標。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名城與粵港澳大灣區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之窗”，承擔著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歷史使命。隨著近年來“一帶一路”合作在葡語國家的深入開展，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往來愈加頻繁，雙邊貿易總額不斷攀升，這對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發展都是重大的歷史機遇。然而澳門在參與“一帶一路”中葡經貿合作，打造“中葡平臺”的過程中，正面臨著落後化、邊緣化、虛名化的困境，究其根本原因是其在中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定位不明、資金不足、宣傳不周等缺憾。對於以上問題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建議是：強化“中葡平臺”的發展決心、明確中葡人才的教育定位、創新中葡人才的教育手段、深化與葡語國家的交流合作。緊抓“一帶一路”中葡商貿發展機遇，加快建設中葡人才高地，推動澳門“中葡平臺”建設脫虛向實。

关键词：一帶一路；澳門；中葡平臺；人才高地

一、引言與綜述

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資訊化、文化多樣化的深入發展，以及全球性問題與挑戰的增加，中央政府於 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在“共商、共建、共用”的基礎上，積極推進與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合作，旨在消除意識形態分歧和社會制度差異，推動各國共用機遇、共謀發展、共同繁榮，實現與沿線各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總體目標。

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發展過程中，無論是解決“一帶一路”戰略構思的理論問題，還是推進實施的實踐問題，關鍵因素在於具備專業理論知識且熟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的專業型人才的品質及數量。從“一帶一路”理論和城市經濟發展實踐來看，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由於人口流動和聚集效應等原因，粵港澳大灣區已然成為中國沿海地區“一帶一路”發展的開放的重心與人才高地。

聚焦於人才高地的建設，學者們主要從人才高地建設的動因、重大意義、實現路徑、建設模式、建設內容等方面開展研究。從建設動因上看，認為是改革開放格局推動、區域經濟結構優化與轉型發展的必然結果；從意義上看，建設人才高地可以吸引集聚高層次人才、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從實現路徑上看，應堅持培養為重點、優化高端人才引進獎勵機制和打造新興產業平臺；從建設模式

作者簡介

[1]殷知行（2000-），男，漢族，江西南昌人，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博士生。

[2]許沈佳藝（2000-），女，漢族，浙江湖州人，中共長興縣委黨校助理講師。

上看，包括教育資源密集型、產業發展驅動型、資源要素彙聚型和制度環境優化型；從建設內容上看，有高水準技術人才、高端科研院校、創新創業基地、新興產業鏈、政府服務平臺、物流交通、宜居環境等。

本文從人才高地的內涵、形成機理切入，並以澳門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打造中葡人才高地為例，系統梳理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境況和實踐策略，為粵港澳大灣區及更多地區建設人才高地提供模式參考。

二、人才高地的內涵及理論邏輯

（一）人才高地的內涵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因此也奠定了建設人才高地的作用。同時，由於我國經濟重心及人力資源整體呈現由內陸向沿海、由北方向南方、由中小型城市向中大型城市轉移的特徵，和城市對外交往許可權的擴大，使得具備沿江、沿海等區位地理優勢和具備較高行政級別與較多優勢政策的地區及城市得以快速彙聚並吸收大量資金、勞動力、產業、科研等發展資源，地緣優勢日漸明顯，經濟地位日漸上升，這就構成了城市發展的集聚效應，成為人才高地建設的基礎。隨著現代化都市圈發展理論的提出和現代交通，如高速鐵路網和都市圈城市軌道交通網的發展與完善，區域中心城市作為都市圈內部市場一體化發展的交通樞紐、文化中心與經濟引擎，成為建設人才高地的最優選擇。因此都市圈內的人才高地，既考慮了區域經濟中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規模、政策優勢、行政級別下的資源導向所形成的中心城市優勢，又兼顧了現代都市圈發展理論中，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因要素稟賦和發展定位而形成的產業分工。

綜上所述，人才高地可以定義為在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區域或都市圈內的具備較高行政級別、較多優惠政策、較優產業結構和較好居住環境的中心城市通過吸收大量高素質人才長期居留工作生活的方式，形成該區域或都市圈內的智力高势能區域。它包括以下特徵：首先，人才高地的關鍵在於政府財政對人才的高投入和高優惠，兼具經濟與政策導向；其次，活躍的科技、金融與商貿服務市場以及完善的法律機制是推動人才高地形成的重要支撐與保障；再次，人才高地應具有與人員就業相適應的高新技術產業鏈，以吸引大量具備專業技術的高質量人才集聚；最後，人才高地的形成加快了區域內發展要素的流動和城市間的分工協調發展，促進了區域內教育、產業、資金、服務等發展資源的一體化。

（二）人才高地的理論基礎

從國際形勢看，地緣力量“東盛西衰”日趨明顯，大國戰略博弈不斷加劇，“一帶一路”倡議深化發展，國際秩序出現深刻調整，全球治理處在重大變革的關鍵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處於醞釀之中，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人才鏈發生重要變革。面對史無前例的歷史變局與全球競爭，創新越來越成為取得全球競爭優勢的關鍵基礎，人才越來越成為引領發展、贏得未來的戰略資源。

從國內發展看，習近平總書記於2021年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中強調，要求“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為我國新時期區域人才發展指明了方向。在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背景下，充分發揮區域中心城市的經濟、科技增長極優勢，帶動周邊城市發展，實現區域協調發展，推動“一帶一路”貿易暢通，需要有充足且高素質的專業人才為中心城市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提供智力支持和創新活力。

國際形勢和國內發展的雙重需求，使得建設人才高地成為區域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實現經濟轉型發展，必須完成的一項戰略任務。然而建設人才高地並非意味著區域或都市圈內的中心城市對人才資源控制的“一家獨大”，也非各地級市以城市本位思想為指導，將本地利益居於區域整體利益之上，進而在人才資源吸引上開展同質化的無序競爭，進而加劇區域內資源分佈不均衡的問題，而是應當通過區域內各城市間的錯位發展，互利共贏彙聚人才，打造協同發展示範區，即雁陣格局。

在雁陣格局中，中心城市作為頭雁區域，依靠對核心產業和尖端人才的掌握，發揮引領作用。周邊城市分別作為強雁區域與尾雁區域，積極開展與頭雁中心城市的產業合作與人才合作。雁陣格局下，區域間互為門戶與腹地，相互合作，相互制約，充分發揮各自高層次人才集聚區域的比較優勢，構成體系相對穩定、功能相對齊全、要素聯繫緊密、對外適應性強的協同式發展路徑。

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不斷變化，原先的單核心驅動、中心城市結構已無法滿足新形勢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因此出現了中心與副中心雙核驅動、雙中心“雙城”聯動，共輓雙核直至被多城市通力合作，協同發展的多核心所替代的現象，這符合雁陣格局下的人才高地建設理論。綜上所述，人才高地的建設要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服務國家區域發展需要和“一帶一路”對外開放大局。

（三）人才高地的模式

在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其地理位置、自然稟賦、政策環境、歷史機遇千差萬別，發展規劃及目標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區域及城市群吸引和培養人才以建設人才高地的模式亦有所不同。美國波士頓、英國倫敦和北京等城市，憑藉著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帝國理工學院、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世界一流高校與科研院所的集聚，使其具備彙聚並培養大批高層次創新型科技人才的能力，尤其是波士頓，憑藉著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頂級科研高校的彙聚，令這座人口不到 70 萬的城市成為紐約灣區中人均生產總值最高的中心城市；21 世紀頭十年，合肥通過極具吸引力和極富遠見的招商引資政策，先後引進海爾、美的、格力、TCL、三洋等十幾家先進製造企業，令其成為與青島、順德齊名的全國三大家電製造基地之一。在隨後的十年間，合肥在保持本地家電製造業穩步提升的同時，進一步引進和培養了京東方、長鑫、蔚來汽車和科大訊飛等高新技術產業，合肥這座原本長期落寞的中部小城，其地區生產總值由 2001 年的 363 億增長為 2021 年的 11413 億，從全國第 82 名增長為全國第 19 名，一躍成為萬眾矚目的“新一線”城市，而膽大心細的“合肥模式”也成為無數城市主政者和相關學者的研究案例；此外，還有紐約和上海憑藉優渥的地理區位以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上海證券交易所，還有《紐約時報》、時代華納、新浪等產業帶來的交通、金融、資訊、傳播等優勢構建的金融商貿人才高地，新加坡則通過更為開放和優惠的人才引進政策，取代香港成為新的亞洲金融中心。

國內外城市群中的人才高地建設，主要遵循以下幾個模式：一是科教資源密集型模式。該模式通過一流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集聚，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為人才彙聚和孵化的核心；二是產業發展驅動模式。通過引進成體系、成規模的創新及製造產業鏈，以吸引應用型和商業化人才彙聚；三是資源要素驅動模式。該模式下，城市將更多依靠交通、金融、資訊等優勢吸引跨國企業在當地佈局全球產業鏈和創新鏈，彙集優秀創新型人才；四是制度環境優化模式。城市為高端人才提供豐厚的薪資待遇、舒適的生活環境、便捷的政務服務，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長期居留乃至定居於此。

三、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現實境況

澳門同時是“一帶一路”倡議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節點城市和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依其獨特的特區行政與關稅優勢，成為大灣區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之一，發展潛力無限。隨著 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澳門定位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以及中國與葡語國家雙邊貿易和文化外交層面的不斷深入，澳門吸引和培育中葡人才，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目標便具備了充足的政治經濟條件。

（一）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淵源

北宋以來，今澳門所在的十字門地區便憑藉繁榮的海上絲綢之路，迅速崛起為中外貿易的樞紐之地。明清之際，隨著葡萄牙對澳門半島的佔據以及新航路開闢帶來的中西方商品、文化領域交流的繁盛，作為彼時西方（葡萄牙）殖民者在遠東地區最重要的貿易口岸，澳門成為中西文化——尤其是中葡文化碰撞交融的重要載體，著名的聖保祿大教堂（大三巴）便建成於這段時期。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以及清王朝的戰敗，清政府逐漸失去對澳門半島地區的控制，以若昂·亞馬留（Joao Amaral）為代表的歷代葡澳總督開始逐步蠶食澳門半島以外的島嶼及陸地，先後佔據了氹仔與路環兩島並設立與葡占澳門市平級的海島市，大量葡萄牙探險家與商人湧入澳門，客觀上促進了葡萄牙文化及葡語教育在澳門的傳播與發展。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東亞經濟的崛起，澳門地區憑藉成衣製造業與建築產業令其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在吸引了一批較有素質的葡語國家移民定居於此的同時，也與眾多葡語國家建立了較為穩定的商貿聯繫，到 1999 年回歸前夕，澳門地區的人均生產總值已超過 1.5 萬美元。

主權回歸後的澳門積極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2003年由中央政府發起、商務部主辦、澳門特區政府承辦的以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和促進中國內地、葡語國家和澳門共同發展的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正式成立，為進一步推進澳門同葡語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普及葡語教育和推進中國與九個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及文化交流成為澳門特區政府的重要工作內容。從2003年至2022年，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總額已由110億美元增長為2148億美元，隨著雙邊貿易的不斷深入，中國與九個葡語國家日漸成為相互間經濟領域不可分離的命運共同體。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臺，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被賦予了“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的發展定位，“一平臺”即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成為“一帶一路”倡議對接中國內地與九個葡語國家的開放窗口。這意味著澳門將在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特色金融、葡萄牙語及葡語國家國別教育、葡語國家商品零售、葡語國家法律援助服務以及相關人才引進及培養等方面進一步深化發展。

（二）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表現

澳門憑藉著背靠珠三角和毗鄰港臺的特殊地理位置、中西交融的獨特文化、“一國兩制”和打造中葡商貿服務平臺的特殊政策以及“一帶一路”開放機遇，獲得了發展先機，地區經濟迅速發展，其承載的功能和意義超過了一般意義的城市，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中心城市之一和吸引、培養中葡人才的高地，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行政方面，澳門作為“一國兩制”政策下全國僅有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不僅享受著省一級的行政待遇，還擁有作為國際自由港且擁有獨立關稅的權利。除此之外，在中央政府授權下，《澳門基本法》還被賦予了澳門高度的外交自主權，持有澳門特區護照的人員可免簽入境葡萄牙、巴西、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莫三比克和東帝汶等六個葡語國家，這為澳門進一步加深同葡語國家政府及社團組織的交往、吸引更多葡語國家高素質人才前往澳門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制度保障。

經濟方面，澳門地區生產總值由1999年回歸之初的65億美元上升為2019年的552億美元，人均生產總值由1.5萬美元上升為8.3萬美元，人均生產總值一度高居全球前三，這與“一國兩制”和“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發展機遇密不可分。然而新冠疫情對澳門經濟的衝擊，顯示出了澳門經濟結構多年來高度依賴博彩及其延伸產業所造成的脆弱性，其地區生產總值在2022年一度腰斬至219億美元，且澳門經濟實力至今未能完全從衰退中復蘇。從產業結構上看，澳門2022年的產業結構比重分別為0:7.7:92.3；行業結構中。澳門作為微型經濟體，其經濟具有特殊性，因此2020—2022年的行業結構指標受新冠疫情影響較大，無法較為客觀真實地展現澳門經濟結構單一、中葡商貿服務平臺建設不完善的現實，故本文依舊採用2019年及之前的產業數據。2019年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澳門產業結構2019》顯示，博彩及博彩仲介業占澳門行業總比重的50.9%，與打造“中葡平臺”相關的批發及零售業、銀行保險業則分別僅占5.6%和6.8%，中葡商貿經濟對澳門整體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較低。

社會方面，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總人口68萬的澳門擁有1萬餘名土生葡人，擁有葡萄牙國籍的人數為8991人；葡語是澳門官方語言之一，因此澳門社會隨處可見中葡文對照的指示牌、標語、語音播報及政府官方檔；葡語教育和針對葡語國家的國別研究更是被作為地區特色學科，聖諾瑟大學、澳門理工大學、澳門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大學等高校均開設有葡萄牙語及相關國別研究方面的課程或研究機構，其中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大學兩所高校的2024年QS排名分別為252和460，科研能力較強，成果轉化率較高。而澳門城市大學則通過設立葡語國家研究院並開設相關碩士、博士課程的方式，成為澳門乃至全國唯一頒發葡語國家國別研究學位的高校。

交通方面，儘管澳門自身缺乏優良的深水碼頭、國際機場、高鐵等對外交通聯繫通道，但是其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內部交通基礎設施的聯動發展，尤其是港珠澳大橋通車後，訪澳人員可由香港國際機場落地後，可直接乘坐港珠澳大橋擺渡巴士入境澳門，總通勤時長可縮短至2小時內。而澳車北上政策更使澳門直接享有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立體化、全方位的海陸空鐵交通網絡。除此之外，澳門特區政府亦積極構建國際交通樞紐，其計畫於2024年啟動對澳門國際機場的擴建工程，於5年內將機場規模擴大至每年可服務旅客1300萬人次。

（三）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進展

把青年人才吸引進來、留下來，是建設人才高地工作推動落實的前提。澳門回歸及“中葡平臺”建立二十餘年，中葡人才高地的建設也由單一的行政部門擴展至文旅、商貿、金融、教育等多元化部門，對中葡人才的吸引與培養對象也由單一語言型人才向多元型、交叉型人才轉變。

1985年，葡語國家都市聯盟（UCCLA）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成立，該組織旨在加強全球葡語國家及地區城市間的合作交流，澳門作為八個創始成員之一簽署了聯盟創始協議。2001年第十七屆葡語國家都市聯盟大會在澳門舉行，這是該聯盟會議首次在澳門舉辦；2003年，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中國商務部與列席的七個葡語國家部長級官員簽署了《經貿合作共同綱領》，綱領強調澳門將加深中國與葡語國家經濟關係發揮平臺作用；2006年首屆葡語系運動會在澳門舉行；2015年，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作為人民幣清算行獲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為葡語國家銀行同業提供清算服務，與17家葡語國家銀行建立了代理行關係；2017年，“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在澳門揭幕。在中央政策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了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葡語國家企業融資平臺、葡語國家融資租賃平臺以及葡語國家貴金屬（黃金）交易平臺，發展人民幣清算、融資租賃、財富管理等特色金融服務；2018年首屆中國與葡語國家高校校長論壇在澳門大學舉辦，是次論壇參會人員就澳門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的橋樑角色，推動中葡高等教育的合作與發展進行了深入探討；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了澳門建立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定位；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澳門應經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在國家“十四五”規劃指導下，2021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年）》提出，澳門將進一步深化中葡雙語人才培養，發揮澳門在大灣區葡語教育方面的引領作用，在中葡論壇（澳門）培訓中心框架下，為葡語國家政府官員提供實習培訓機會並推動中葡青年創新創業。同年，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共同出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要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中葡國際貿易中心和數字貿易國際樞紐港，推動傳統貿易數位化轉型，並充分發揮澳門對接葡語國家的窗口作用，打造中國—葡語國家金融服務平臺。在建設以上高新技術產業鏈的同時，制定吸引和集聚國際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大力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建設國家級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

儘管中央政府與澳門特區政府為打造“中葡平臺”和建設中葡人才高地推出了多項政策，但實際收效卻不容樂觀，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其一是落後化，“人工智慧+”“大數據+”等以跨界融合為特徵的新產業的快速發展，迫切需要具備跨學科思維與能力、多項技能集於一身的複合型人才。隨著國家“十四五”規劃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對澳門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求的提出及澳門打造中葡特色金融、葡語國家人才培訓、中葡商品跨境貿易等高新技術產業鏈的佈局，澳門所急需的中葡人才也應由單一的語言型人才向複合型人才轉變。然而，澳門特區《2021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依舊將建設中葡人才高地定義為建設“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而由澳門貿促局和中葡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共同建立的旨在為中葡人才和相關企業提供雙向選擇資訊管道的中葡人才資訊網，也將中葡人才狹義地定義為“中葡雙語人才”，將單一的語言能力置於綜合能力之上，這是顯然落後於當前國家所宣導的培養複合型人才理念的。

其二是邊緣化，自2003年中葡論壇（澳門）及其部長級會議機制建立以來，儘管中國同葡語國家間的雙邊貿易總額不斷增長，但實際經澳門撮合完成的中葡商品貿易額度卻微乎其微，2021年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進出口總額高達2009.48億美元，而當年澳門與葡語國家之間的進出口總額僅為7.3億澳門元，僅占當年澳門對外貿易總額的0.005%，這體現出澳門所建設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及其相關產業鏈正在被中國內地廣泛參與中葡雙邊貿易的地區所邊緣化。在葡萄牙語語言培訓方面，筆者通過與赴葡語國家工作的十餘名熟練掌握葡語溝通的華人交流所知，中國內地多座城市已建立起了多家成熟的應用型葡萄牙語速成培訓機構。與之相比，澳門的葡萄牙語教學培訓則更多地由高校等科研機構承擔，其絕大多數培訓對象為高校學生和少量葡語國家的政府官員，教學影響力和實際工作運用程度遠不及中國內地的培訓機構，這體現出澳門所建設的“中葡雙語人才培養基地”也處於主流葡語培訓的邊緣。

其三是虛名化，葡語雖作為澳門的官方語言之一，在官方檔與活動中被廣泛運用，但實際將葡語作為日常工作與生活用語的人卻很少。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21 年人口普查情況顯示，在 68 萬澳門常住居民中，以葡語為日常用語的人數僅為 3949 人，占總人口比重僅為 0.005%，這一占比甚至遠小於以英語作為日常工作生活用語人口占比的 3.4%。中葡論壇（澳門）培訓中心自 2011 年成立至今，總計舉辦研修班 54 期。其培訓內容涉及政府管理、金融、產能、酒店、旅遊、會展等多個方面，培訓學員總數 1488 人。但相對於“中葡平臺”與中葡人才高地的實際建設需要而言，這個數字仍舊杯水車薪。

四、澳門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的路徑策略

（一）有恆共識

代表社會共識的共同價值是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前提。不論是破解社會治理碎片化難題，還是啟動治理內在動力、優化治理結構，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都有助於實現協同治理的效益倍增。澳門在建設中葡人才高地過程中，需遵循國家發展意志和市場經濟規律，實現從重點行業的人才培育到形成社會全產業鏈的人才佈局，以國家意志和澳門各方利益群體的共同價值為導向，多規劃、多調整，加強與各方利益群體的交流、對話和協商，在交往中協商，在協商達成共識，實現合作共贏。在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社會共識形成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應發揮協調溝通的首要作用。一是利用好澳門得天獨厚的政策優勢，建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與葡語國家政府的常態互訪，注重互學互鑒；二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強化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及內地兄弟城市的合作交流機制建設；三是在澳門本地社會深入宣傳澳門“中葡平臺”及中葡人才高地打造的重要意義，以發佈重要檔和開展宣傳講座的方式，強化本地民眾及社團對於“中葡平臺”的認知度，凝聚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有恆共識。

（二）有效市場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中，產業合理佈局、合理分工，城市合理定位，需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促進要素自由流通，增強區域整體活力。一是粵澳兩地在會議展覽專案、國際聯合合作、商事法律服務、資訊調研交流、國際商會建設、人才培養上積極加強聯動，整合貿促資源。共同在海內外舉辦中葡經貿合作展會與葡語國家商貿推介會，為企業提供更廣闊的海內外市場；二是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依託“一國兩制”和橫琴深合區政策優勢，積極推進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特色金融服務、中葡法律服務、商務葡語教育培訓、中葡青年創新創業中心等新興產業鏈的構建；三是創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澳門擁有 10 所高等院校，其中有諸如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的國際知名與研發能力強的高校，也有如澳門城市大學和澳門旅遊學院的地域特色高校，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中領先的高教高地之一。除此之外，亦有如思路智庫、澳門學者聯盟、澳門經濟學會這樣的民間社團智庫組織。如能充分整合澳門高校與民間社團智庫的科研資源，加速科研成果轉化，必能構建澳門科研集群優勢，解決澳門本地原始創新力不足的問題。

（三）有力社會

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使社會組織成為參與區域合作的重要力量，甚至驅動政府職能轉變和治理方式的創新。作為一個典型的社團型社會，澳門要充分發揮民間社團組織和個人在打造“中葡平臺”以及建設中葡人才高地過程中對於融資、科教、宣傳、整合等工作的重要作用。一是推動澳門街坊聯動。重點圍繞街坊宣傳、街坊教育、人才培養、人才服務、營商環境等五個方面，攜手打造中葡人才建設的基層示範；二是推動媒體電視及報刊設立葡語國家資訊及中葡人才培養專欄，宣傳“中葡平臺”及中葡人才相關動態，以實現社會各界緊跟發展潮流。三是積極推動社會組織為澳門建設中葡人才高地建言獻策，充分發揮澳門民間智庫的作用，開辦各類打造“中葡平臺”與中葡人才高地建設相關的研討會、論壇，邀請海內外及澳門本地專家學者和相關利益群體代表，從政策設計、人才定義、人才培養、產業構建、資源共用等多個維度展開討論，並將相關研究成果出版發行，為澳門“中葡平臺”新興產業鏈建設和中葡人才培養提供智力支撐。

五、結論與展望

人才高地是區域經濟聯動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城市群中發揮著產業引領和綜合服務功能。人才高地具備很強的資源聚集與輻射帶動作用，通過與周邊的區域互動發展，可以帶動區域資源優化配置與產業分工合理化。成熟的人才高地的本質就是以產業聚集吸引和培養相關人才，再以人才的聚集引領和支撐其產業進一步發展，形成“產業聚集人才，人才支撐產業”的良性格局。

本文以澳門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案例探究了人才高地的形成與發展，並演繹出實踐路徑。希望通過微渺的建議為澳門當前打造“中葡平臺”和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現況紓困解難，發揮個人作為社會力量構成之一對澳門建設中葡人才高地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周毅平、闕閱. “一帶一路”戰略的人才支撐與教育路徑[J]. 教育研究, 2015, 36 (10), 4-9.
- [3]冷民、薑涵. 構建與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匹配的人才高地[J]. 中國科技人才, 2022, 2022 (1), 24-28.
- [4]原梅. “一帶一路”視域下沿線城市對外開放芻議[J]. 黨史博采 (下), 2019, 2019 (12), 48-49.
- [5]中共上海市委. 加快建設高水準人才高地[J]. 求是, 2021, 2021 (24), 26-30.
- [6]薄貴利. 論打造世界級和國家級人才高地[J]. 中國行政管理, 2019, 2019 (6), 6-11.
- [7]徐芳. 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N]. 經濟日報, 2022-11-30 (10).
- [8]戚耀琪. 人才高地如何建設好，人大代表力量不能少[J]. 人民之聲, 2023, 2023 (9), 62.
- [9]申金升. 高水準人才高地建設的若干思考[J]. 今日科苑, 2022, 2022 (9), 26.
- [10]胡明遠、龔璞、陳懷錦、楊竺松. “十四五”時期我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培育現代化都市圈[J]. 行政管理改革, 2020, 2020 (12), 19-29.
- [11]汪懌. 高水準人才高地建設：基本內涵、核心角色與發展對策. 中國黨政幹部論壇[J]. 2021, 2021 (12), 57-61.
- [12]李普. 加強區域科技人才發展研究，推動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建設[J]. 中國科技人才, 2021, 2021 (5), 3.
- [13]劉晗、黃慶華. 發揮中心城市引領作用，推動“一帶一路”貿易暢通[J]. 中國人大, 2017, 2017 (8), 32-33.
- [14]蕭鳴政. 創新建設大灣區高水準人才高地[N]. 光明日報, 2022-8-28.
- [15]邵任薇、林姍、林綺珊.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珠三角地區人才政策研究[J]. 探求, 2022, 2022 (3), 55-66.
- [16]劉沖. 雁陣格局視角下的高層次人才區域佈局和協調發展問題研究[J].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 2023, 2023 (8), 12-20.
- [17]李曉楠、殷知行. “雙迴圈”背景下澳門文旅產業發展機遇與路徑研究[J]. 中國商論, 2023, 2023 (14), 89-92.
- [18]黎沛文、關子鄧. 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的引才制度之維——以“雙區”建設背景下的深圳為例[J]. 青少年研究與實踐, 2023, 38 (1), 39-51.
- [19]朱賀玲、郝曉晶. 新文科建設背景下的複合型人才培養：新變局、新挑戰與新思路[J]. 高教探索, 2023, 2023 (4), 20-25.
- [20]殷知行、楊淇然. 粵港澳大灣區視角下澳門城市品牌構建路徑研究[J]. 國際公關, 2023, 2023 (5), 116-118.
- [21]黃新華. (2023). 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邏輯進路——基於應對突發公共事件視閥的考察[J]. 國家治理, 2023, 2023 (17), 69-73.
- [22]毛豔華. 粵港澳大灣區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創新研究[J]. 南方經濟, 2018, 2018 (12), 129-139.
- [23]陳朋親、毛豔華、榮健欣. 城市群“雙城”聯動的理論邏輯與實踐策略——以粵港澳大灣區廣州、深圳為例[J]. 城市發展研究, 2021, 28 (12), 110-117.

[24]李向光. 打造產才融合的縣域優勢[J]. 中國人才, 2023, 2023 (3), 75.

Research 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ino-Portuguese talent highland in Macau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YIN Zhi-xing¹, XU Shen-jiayi²

¹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²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hangxing County Committee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posed by the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 is the top-level design idea for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Macau to build a "China-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trade cooperation service platform," with the overall goals being "policy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bonds." As a historical city wher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blend, Macau, being the "open window"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s deep involve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building a "China-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trade cooperation service platform." In recent years, as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has been deepened in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with the bilateral trade total continually climbing, creating a significant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However, Macau is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backwardness, marginalization, and nomin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Belt and Road" Sino-Portugues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building the "Sino-Portuguese platform."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include the lack of clear positioning, insufficient funding, and inadequate publicity in the training of Sino-Portuguese talents. This article suggests strengthening the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the "Sino-Portuguese platform," clarifying the educational positioning of Sino-Portuguese talents, innovating educational methods for Sino-Portuguese talents, and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By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Sino-Portuguese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ino-Portuguese talent highland should be accelera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cau's "Sino-Portuguese platform" should be promoted from nominal to substantive.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um Macao; Macau; Sino-Portuguese talent highland